

姜夔源

姜夔源

与音乐家摇篮

黄远渝 编著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芳源

与音乐家摇篮

黄远渝 编著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源澧与音乐家摇篮 / 黄远渝编著. —北京: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81096-274-2

I. 黄... II. 黄... III. 黄源澧(1916-2006)—纪念文集

IV. K825.7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1273 号

黄源澧与音乐家摇篮

黄远渝编著

出版发行: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A5 印张: 11 彩插: 56 面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1096-274-2

定 价: 36.00 元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鲍家街 43 号 邮编: 100031

发行部: (010) 66418248 66415711 (传真)

爱乐敬乐，育人化人，创业
维艰，矢志不渝。在重重困难之中
毅然创建高水平的少年乐团，并
百折不挠地推进其发展壮大，为
中国的交响乐事业铺就坚固的基
石。在新中国的音乐教育园地
里辛勤耕耘数十载，做出了永远
值得后人纪念的贡献和成就。

许值《黄源澧和音乐家摇篮》
一书出版，书以致贺！

喻宜萱 时年九十八岁
2007年12月28于北京

題「黃源澧之音樂家搖籃」書

能看到自己作成果
的音樂家是一位幸
福的音樂家

嚴良堃敬題
戊子春

黄源澧教授是我国少年儿童音乐教育的奠基与开拓者，作为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和教师，也对我国大提琴演奏艺术的提高、进步及管弦乐事业整体人材培育和交响乐队建设、发展全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高尚品德、光辉业绩使我们众多后来者难以忘怀。

黄远渝著《黄源澧与音乐家摇篮》一书出版，将为人们展示这位音乐界一代名师的诸多方面生动形象和品格内涵，也会给读者带来教益。谨对此书的问世致以诚挚贺忱并附以对源澧老师的深切怀念。

吴祖尧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初冬

怀念尊敬的老校长

俞慧耕

1958年初，我从上海被调来天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时学校放寒假，校内寥无几人，我也不认识附中任何人，所以刚到不久，宗群就陪我去拜访赵沅院长，他们在重庆参加抗日歌咏活动时就认识。我与赵沅在1947年他从国外回来路过上海时，曾有一面之交，相隔十年再次相聚，大家都很高兴。赵沅虽身为院长，仍很随和，没有什么指示之类的长篇语言，我记得他轻快地只讲了一句：“希望今后你们三套马车能驾驶得更好。”这，我当然理解，不能多一个人反而削弱附中工作。“团结”是今后工作的关键。

新学期开始，我就参与附中的工作。首先见到是方堃校长，后见到黄源澧校长，他们两位给我的初步印象都很亲切。三套马车就在风风雨雨中开始上路行驶了。

现在黄校长离开我们已有一年多了，回忆往事仍历历在目。我常常会想起他那似笑非笑、似愁非愁，恰又是十分平静的表情。我从未听过他对全校师生作过什么长篇大论的报告，也从未见过他对学生有过什么训斥。他的处人、处世、处事，总是那样的平淡亲切，一切与人为善。在我与黄校长共事过程中，使我逐渐地体会到他的为人之道和教育理念。

我到天津后不久，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学校要从天津搬往北京，全校兴高采烈。从1950年建院后大家就等待着这个机遇的到来，一直未成，有老师说：“你真是运气，不到半年，你就能进京了。”当年，党委指示要有部分师生员工留在天津，成立天

津音乐学院。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谁去谁留，众说纷纭。大家都希望来北京，谁将被留下呢？记得当时讨论时，党委虽有原则，但具体人员还得由附中自行定夺。即时，黄校长提出一个原则意见：“给天津留下来的也要有骨干教师力量，使天津音乐学院和附中也能马上开始办学，不能只顾及我们自己呀！”我在旁暗暗心想“这才是无私的领导风格，不以一己为主，要照顾到他人”。最后，当名单宣布时，虽未能十全十美，基本上做到了“留者快”，“去者乐”，平静地度过这一关。

记得另有一次，赵院长召开系主任和附中校长的联席会议，讨论有关学生的培养问题等等，黄校长发言的大部分内容我已记不清，当时他提到“对学生的养成教育问题”。这“养成教育”四个字对我影响很大。我立时反思，我只知道按照教学大纲的规定各科教学内容，以及附中为院部培养后生等等，这些都是书面文字游戏，究竟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又如何养成呢？使我产生很多疑团。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真正了解在音乐教育中的“养成教育”的具体内容和它的真正涵义。后来，我不仅深入各文化课听课，同时也深入听各音乐专业课的教学实况，和听学生的学习演奏会，以及“红领巾乐队”的排练演出等音乐实践活动。我是在学习——工作、工作——学习过程中逐渐使我懂得黄校长提出“养成教育”的真正内容的涵义。音乐教学与教育是在学习心理上要有一个逐渐积累和储备的养成过程。也就是无意识地被动地接受的过程，被动地从听觉接触音乐到学生自己亲自动手接触乐器主动地演奏操作，而达到老师所要求的过程。这在个体认知心理上是一个质的突破。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才真正听懂音乐是什么，音乐的语言、音乐的表现、音乐的情境，音乐所表达的丰富多彩的内容等等。“养成教育”也就是黄校长的亲身体会和一辈子辛勤教育学生的过程。有多少音乐家，在黄校长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养成；有多少个大提琴演奏家，在黄校长亲手教育过程中

养成；他们都在为祖国的音乐界贡献着力量。

尊敬的黄校长，我是在您的教育和引导下逐渐使我步入这音乐教育的行列，使我懂得如何通过音乐学习去启迪智力，去改变人生。您的默默的教育，我终身难忘。

从天津搬来北京时，我们大家都住在三号楼，共用一个大厨房，共用一个大厕所，虽然生活上条件很差，但大家都辛勤地工作着，和谐地生活着。我们的孩子们还组织了一个小女孩篮球队。去年（2007年）三多在美国找到一张非常珍贵的“音院女子篮球队”的照片，她电传给朵儿，我们接到照片后，真是感慨万分。照片中三多、朵儿、远津、解梅、咪娜、小毛六位毛头小姑娘，手托着篮球，好神气好自信呀！这美好的过去，耐人寻味。

后来，黄校长搬到南线阁去了，我们也搬到新一楼。黄校长又被调离附中去院部管弦系任系副主任。每当他到学校来，上、下午系里都有课时，中午，他都到我们家来，非常随便地和我们一起用午餐，午后还能小小地午休片刻。那时夏之秋家也和我家住同一个楼，他住一层，我家是四层，黄校长、夏先生和宗群三位老朋友，常常相聚，畅谈往事，原来在重庆时就已认识。有时，我在旁边听他们闲谈，使我真正了解到他们之间可贵的友谊。

有一天（记得好像是星期四）黄校长破例没有来我们家用午餐，宗群就担心，是否老黄本周身体欠佳，没法来上课呀！当下一周他又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才知道上周他调课，没有来院部上课，才消疑团。又有一次夏老从一层艰难地爬到四层来，敲我们家门，当宗群开门，一看是夏老，但夏老师什么话也没有讲，只是说：“唉，你还好啊！”原来，宗群每天准备午饭时，都会在厨房唱上几句，以放松放松自己的身心，这歌声从四层传到一层，是夏老师所熟悉的。那天，他没有唱，夏老师就担心，他是否病了？要夏老师爬四层楼是多么不容易呀！这真诚的友谊，使人动情。

又有一天，他们三人回忆在清风店时期的情景，首先是宗群

问老黄：“你还记得吗？有一天我们在田里劳动，远远看是夏老师挑两桶水，在田边摇摇摆摆地走来，为大家送水喝？你喝了没？”老黄摇摇头。宗群说：“这水，能喝吗？再渴，我也不能喝呀！”三位老人会心地笑了。患难见真情呀！老黄说：“有些人只准许自己革命，不准别人革命！他们能理解我们吗？”这是在难苦岁月里，跟党共同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心里话呀！

尊敬的老校长您放心，我们深深地理解您、敬爱您，您的一生是和我们当今的年轻一代的音乐家们共同走过来的，赵院长称附中是“音乐家的摇篮”，您是我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这个“音乐家的摇篮”的真正开拓者和缔造者。您在抗战和解放战争艰苦的年代里，保护着这个摇篮，维护着这个摇篮，然后又建设着这个摇篮，使她更美丽、更结实、更茁壮。您正确地把握着学校前进方向，使我们驶向光辉的前程。您无言胜有言，以您的真诚，纯朴的人格魅力激励着我们，感动着我们。我们永远怀念您。今天，您的雕像坐落在我们附中的大堂里，永远看护着我们，使我们永不迷失方向。

尊敬的老校长，您放心，我们将永远照您指引的方向，努力向前，为祖国音乐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2008年3月于北京

怀念黄源澧校长

方 堃

1956年6月，我从中央文化部调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担任黄源澧校长的助手。1958年暑假附中迁北京后不久，黄校长又同时兼任院管弦系主任。直到1960年1月，黄校长正式调到管弦系，这三年多，我与黄校长共事，向他学习，受益匪浅。

黄源澧校长的一生，可以说，全部贡献给了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是我国专业幼儿少年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奠基人。

他经常向我提到，“音乐演奏人才，必须从幼年开始培养”，对此，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94年11月10日他给杜家华先生的信中说：“国立音院幼年班的创建，不是个别人的愿望，而是当年弦乐界同仁共同的心愿。”他很赞扬原国立音院院长吴伯超先生，认为“吴伯超先生毅然奋起，艰辛创立国立音院幼年班，功不可没”。黄先生就是当年竭力主张必须“正式建学”、“从幼培养”的弦乐界同仁之一。1945年成立幼年班开始，黄先生就是幼年班主要负责人之一。抗战胜利后，1946年幼年班迁常州，这是幼年班最重要的四年刻苦学习阶段。胡国尧同志回忆：“当年我们在酷暑烈日下，汗流浹背，找个树荫下练，寒冬腊月，找个背风地，晒着太阳练，十个指头冻得又红又肿，仍坚持不懈。”黄先生作为教务主任，不仅执教大提琴，而且全面负责幼年班的教学工作，他从上海请来各种专业的专家来兼课，他亲自组建乐队、亲自指挥、亲

自排练，一直到1950年合并到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又带着这批学生，参加中国青年文工团到苏联、东欧各国作巡回演出一年多。1952年回国后，就把这支完整的乐队交到李凌同志手中，成为后来中央乐团的班底，也是五十年后建立国家交响乐团的骨干，从1945年到1952年短短七年，他向人民交出一支功底厚实、声部完整、影响深远的“交响乐队”，那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份。

1950年以后，幼年班改名少年班，黄源澧先生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主任，全身心扑在工作中，从1951年招收刘诗昆、郑伯农等51班开始（男女合班），年年招生，至1957年达到300多学生的规模。有一个独立院子的校园，专业设置有钢琴、管弦、民乐（多由院部老师兼），声乐、理论等学科；学制，除中学部六年，还设有附小三年；有一支高水平的专业教师和完善的文化课教师队伍，文化课、专业课老师共同组建起一个强有力的班主任团队；教导、教务、总务后勤等机构齐全；创建了一套相对完善、实用的教学计划。经文化部批准，于1957年6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这是黄源澧先生的又一个七年，向人民交出第二份优厚重礼。他不仅为附中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我国其他音乐学院组建附中作出切实可行的范例。

黄源澧先生虽然调离附中去管弦系任副主任，但他对附中的影响是长远的。

刘诗昆中学六年是在附中度过的。1957年正是刘诗昆六年级，他参加匈牙利李斯特钢琴比赛，由于他演奏李斯特第六匈牙利狂想曲的出众表演，匈牙利给了他一个“特别奖”，奖给他一缕李斯特“头发”的莫大殊荣。从他开始，往后半个世纪里，附中有数不清的国内、国际各种专业比赛获奖者。

1959年，附中诞生的红领巾乐队是全院师生深爱的掌上明珠、中央乐团李德伦同志曾恨不得把红领巾乐队全盘端去，建立一个中央乐团第二乐队。我们的钱老，钱学森同志，一个人静坐

在大礼堂的观众席里，长时间的聆听红领巾乐队的排练，久久不愿离去，当时正是徐新老师带着红领巾乐队，在大礼堂舞台上第一次试排比才的《法兰多拉》，为南下演出准备新曲目，不想一次合成，出现奇迹般的艺术效果。1962年暑假，红领巾乐队第一次南下，到武汉、广州、上海作巡回演出，在国内音乐界，掀起一个不小的波。这样一个红领巾乐队，她的真正的“先行者”，正是黄源澧校长亲手培育起来的常州幼年班乐队，红领巾乐队的全部成员六七十人，正是50年代黄源澧校长主持的附中培养起来的在校学生。其后，一代接一代，一直发展到今天附中的少年交响乐团，她已是附中教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是附中的骄傲。

黄源澧先生很关心少数民族地区音乐人才的培养，1954年，新疆送来图木莉斯学钢琴，附中无条件收下这位没有钢琴基础的维族女童。文革以后，她在新疆做出了喜人的成绩，担起了新疆大学的音乐系主任，培养了大批学生，有的成为新疆大学的骨干教师，有的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1957年暑期，内蒙要求附中为他们办一个内蒙班，培养一个管弦乐队和钢琴师资。黄源澧先生非常支持。派我和几个管弦老师去呼和浩特，临行前，他说了一句话：“告诉内蒙，不能性急。”我们到呼和浩特，招了文化局推荐的20多名学生，有弦乐、管乐、打击乐、钢琴等专业。我告诉内蒙文化局长宝音特来，黄源澧校长说了：“内蒙建乐团，不要性急。”起码要二代甚至几代人的接力，一代会比一代好。事实证明，就是这样，这批学生毕业回到内蒙，组织起管弦乐队。文革后，70年代末，附中又为内蒙招来第二批代培人才，那都是有一定专业基础的了，经过附中到大学，出来一批很优秀的演奏家、教育家，大大提高了内蒙的乐队水平和教学水平。现在留在中央音乐学院担任大提琴教研室主任的那木拉（蒙）就是其中的一个。记得1957年招来的乌云其其格学钢琴，年龄不到10岁，汉语不会讲，没见过钢琴，在附中整整学了八年，非常努力，回

内蒙，后来担任内蒙艺校的钢琴系主任。十几年以后，她的女儿考上附中，其演奏水平，显然出于蓝而胜于蓝，比乌云其其格高上一大节。黄源澧先生的预言是准确的。

黄源澧先生“爱生如子”，在学生中，尤其在幼年班的同学中有口皆碑。常州幼年班时期，国民党乱发钞票，民不聊生，100元票面的法币，连叫花子都不要。换制金元券后更糟糕，早晨够买一头牛的金元券，到了晚上，仅够买上一根牛尾巴。黄源澧先生从常州到南京国立音院领经费，一领到手，务必马上背起麻袋装的金元券，赶紧往火车站跑，挤不进车厢，只好冒着生命危险，抱着麻袋坐在车厢顶上。这是十分危险的，因南京与常州之间有隧道，即使不被晃动的火车晃下车来，也有被隧道顶刮下车来的危险。黄先生根本顾不得这么多，一到常州就直奔粮店，把不值钱的金元券全数兑成粮米，这样才勉强保住全体学生一天两稀的半饱。1949年四月，常州解放前夕，幼年班尚有六十多学生，幼年班的老师们有回老家的，有去南方的，有奔台湾的。黄源澧老师拒绝去台湾，不相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种种污蔑和造谣，毅然决然带领全家六口人，冒着战火，和郑华彬及少数几位老师留在常州灵官庙（幼年班校舍）呵护着这批无亲、无友，无家可归的儿童，在炮火中与学生“共生死”，迎来了常州的解放。此情此景，在学生幼小的心灵中，永远忘不了，现今70多岁的老幼年班同学，一提起这些往事，都会动情而掉泪。

黄源澧先生致力于音乐幼少年教育，十余年如一日，但他从不孤单，任何时期，他总是博得周围人们的尊敬和帮助。如郑华彬先生，这位印尼爱国华侨，变卖全部家产，回国抗日，从青木关开始，一直是黄先生最得力的后勤助手，直到迁校北京；如廖辅叔、盛雪、夏之秋、赵东元，吴伯超等诸先生以及从上海请到常州来教课的中外音乐专家们，都是黄源澧先生幼年班时期的积极支持者；新中国成立，在天津少年班、附中时期，更是博得教

务主任黄翔鹏、办公室主任王金贵、各学科主任马思聪、刘培荫、褚耀武、王治隆、王连三、朱起云和日夜与呵护着学生的班主任以及全体教师和工勤人员的同心协力，包括 1956 年到 1958 年期间调来的俞慧耕、王正中、常韵铨和我，都是黄源澧先生的积极“支持者”。这种支持，一方面来自大家对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事业的崇高信念与追求、和对三百学童的爱心，同时，还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那就是黄源澧先生的人格魅力。

黄源澧先生对共产党和党的政策有很高的信任和崇敬，据吴元芳、黄文润、宁静、唐振汉、朱兆钰等老班主任们回忆，50 年代，全校教师多次学习党的教育方针，黄先生非常赞赏“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提法，“如何树立学生的正确人生观”，成为全体教师经常切磋的一个重要课题。黄先生为人公正、待人谦和，做的多、说的少，有功绩、不张扬，淡泊名利，特别重视“对人要尊重”，包括尊重和爱护犯有错误的学生。黄先生的这种高尚品格，教职员工们、同学们，看在眼里，敬在心里，对建树附中的好校风和好学风，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当年附中有三个女同学患有风湿性关节炎，每逢阴天病情发作，迈不上楼梯，她们的班主任和大男同学轮流背她们上楼进教室。有一个男同学有尿床症，同寝室的同学趁他不在房里时，轮流每天为他晒褥子。去年附中成立 50 周年校庆，谢秀珍回忆她刚被录取初一，迟了两周报到。第一天上视唱课，就被洪月华老师叫到黑板前，一问三不知，老师快生气了，当洪老师知道谢秀珍刚刚报到，老师就叫谢秀珍下午到老师家去补课，谢秀珍说：“那天下午不但补了课，而且洪老师还留我美美的吃了一顿丰富的晚餐。”谢秀珍说话的神态，好像刚刚吃完晚餐回来似的。2003 年，中央音乐学院排练厅举行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附中五三班入学 50 周年纪念班会。主持会的是当年的班主席麦美生同学，她左边坐的是中央音乐学院现任院长王次炤、党委书记郭淑兰及副院长副书记，右边坐的是老班

主任宁静老师和当年辅导员五一班的刘诗昆，观众席上坐的是老校长老教师，还有当年终日蹬着三轮到各处选买便宜爽口的鸡、肉、蛋、菜的陈英武，那时他年轻叫小英武，现在已是满头白发的退休老英武了。还有长期负责出借乐器的刘珍碧，后排坐的都是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欧洲和全国各地的五三班全体同学。会议一开始，麦美生就向老教师老职工，讲了一席感人心肺的开场白，话的大意是：“我们十二三岁进附中，是你们创建了这样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像爹妈一样爱护我们，帮我们打下一个坚实的好基础，教给我们学做人，学音乐，学做学问，让我们愉快地走过人生最重要、最珍贵的整整六年的成长道路。50年过去了，我们也都60多岁了，今天我们回来了，续开五十年前的班会，我首先代表我们班全体同学向你们致以最诚挚、最亲切的感谢，愿你们健康长寿。”随着麦美生话音结束，她深深地向老师老职工们鞠了一躬，很多老师和老职工眼眶都湿润了。告慰尊敬的黄校长，你教导出来的好学生已是玉树盈阶。黄源澧先生离开了我们，而他那哲人的道德风范，将在中央音乐学院衣钵相传。

作者的话

黄源澧是我的父亲，自小我就在他所创办和完善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这个环境里成长，手头又有父亲对这个时期的真实而具体的材料，于是我决定根据我父亲留下的这些文字，及我的记忆和耳闻目睹的经历，来写编《黄源澧与音乐家摇篮》这本书。

父亲写的这些材料，是他 50—54 岁记忆清晰时留下来的，从他 1937 年开始工作，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才不过 30 年的历史而已，记忆犹新。又根据我对父亲的了解，他对发生过的事情只会如实地讲述，不会编造和杜撰，所以又是可靠而准确的。父亲的材料自然成为我这篇文章的主轴。

我们查阅了中央音乐学院艺术档案室、文化部档案室、艺术研究院档案室等处，查看了历史资料。通过拜访、写信和打电话等方式，与父亲的同事、朋友、学生进行交谈、采访，得到他们所了解我父亲历史的片断或某件事情的过程、环境以及因果关系，我们再加以清理和归纳，根据父亲描述的主轴，加以澄清、充实、完善。我们翻阅的资料足有数尺厚，我们采访了近一百人，得到了许多生动的、鲜活的故事，更显现出我父亲饱满的、真实的形象和感人至深的人格魅力。

父亲是一位极其低调的人，若不记录下来，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将会淹没在莽莽的尘埃之中。写出来是我们的责任：对可敬的父亲，是一种安慰；对那些逝去的诸多曾经为此努力奋斗过的